

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靳小怡 任 峰 悦中山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 2005 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是促使农民工婚恋观念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观念显著影响了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社会融合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婚恋观念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反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观念更趋传统。农民工在“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变化促进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融合,但也有可能加剧“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发生。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网络; 婚前性行为; 婚外性行为

【作者简介】靳小怡,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峰、悦中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陕西西安:710049

1 研究背景

在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婚姻家庭观念将逐渐摆脱传统家庭的控制,个人价值和幸福开始高于世系和家庭的延续(W. J. 古德, 1998)。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传统两性模式,也将逐渐被打破,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人们将有更多的选择(李银河, 1991)。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人的婚姻观越来越多元化,对“不婚”、“闪婚”和“隐婚”等现象已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谢小亮, 2005),在婚前性关系、非婚同居、婚外恋等问题上也开始表现得较为开放和宽容(袁阳, 2005)。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农村婚恋观念的主流文化,择偶观念、生育观念和传统的贞操伦理观念均发生重大变迁,但同时在农村婚姻家庭观念的一些传统特征还是保留了下来,其现代性还不如城市(郭显举, 1995; 王跃生, 2002; 杨秀莲, 2005)。外出务工使农民工的生活场域从传统的农村迅速地转换为工业化大都市,其恋爱观、择偶观、婚姻家庭观会在城市的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冲击下发生改变(风笑天, 2006)。打工经历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和取向影响显著,已有研究表明,部分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已经突破传统观念(陈印陶, 1997),处于婚育年龄高峰的外出打工青年中较普遍存在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现象(风笑天, 2006)。因此,深入研究农民工的婚恋观,对于了解农民工的婚恋需求和行为、有效控制婚外和计划外生育、提高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水平、保护女性农民工和婚外生育子女的合法权益、促进城乡社会的婚姻家庭稳定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校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66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71083));“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重点项目(07200701)、美国 Santa Fe Institute 国际项目基金、斯坦福大学联合资助项目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中, 其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得以重新构建, 并对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网络视角是一种更容易走进农民工特殊生活的范式(渠敬东, 2001)。国际移民研究和国内移民(主要是农民工)的研究都指出, 社会网络对移民来说其作用至关重要, 是移民流动迁移行为发生的重要支撑和主要渠道(Massey et al., 1998; 王春光, 2003; 王毅杰和童星, 2004); 农民工借由社会网络获取其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来解决求职、居住等困难, 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从而减轻农民工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Massey et al., 1987; 曹子玮, 2003; 李树茁等, 2007a, 2007b)。国内外有关流动迁移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和生育控制行为的研究发现, 流动后与社会网络成员的信息交流与互动有助于流动人口理想婚龄的上升、生育控制行为从不避孕向避孕、从传统控制方法向现代控制方法的转变, 表明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人际互动对于流动人口观念与行为变迁的影响(杨绪松等, 2005; 靳小怡等, 2005;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Eklund, 1999; Kohler et al., 2001)。然而, 目前有关农民工婚恋观念的研究, 多停留在现状描述和认识, 仅少数研究对女性农民工初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郑真真, 2002; 靳小怡, 2005), 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婚恋观念、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进行的定量研究还少见报道。

本文利用 2005 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 基于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现象的态度, 来考察农民工群体的婚恋观念, 探索性地分析婚姻讨论网络、社会融合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态度产生的影响(李树茁等, 2006)。

2 研究设计

2.1 分析框架

农民工生活场域的转变带来了个体职业、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其观念与行为将发生改变, 社会网络因素、社会融合因素和个人因素均会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产生影响。

2.2.1 网络因素

农民工对待婚姻家庭的观念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舆论环境, 他们通过自己的见闻尤其是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其自身的观念才得以形成或发生变迁。而反映农村流动人口所受到的影响的载体就是其婚姻讨论网络。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包含两个不同的过程: 一是社会学习, 是指人们从其他人处获得对决策需要的有关知识和经验, 以降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二是社会影响, 是指其他人采取的行为和观念在群体中的流行程度对本人的影响(Kohler & Behrman et al., 2001)。社会网络通过为个体提供信息和施加影响来推动社会学习和社会影响两个社会互动过程。个体会以网络成员为标准, 来修正或维持自己的观念与行为, 进而逐渐与参照群体趋于一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和观念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传递给农民工并对其产生影响。可能对农民工婚恋观念产生影响的社会网络变量包括规模、弱关系、网络成员影响的综合效应。

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 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越丰富, 社会资本越大, 网络成员的观念可能更具多样性。规模越大, 网络成员的观念的异质性可能越高, 通过与具有不同婚恋观念的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互动, 可能会促使其既有的婚恋观念发生转变。

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对个体观念的形成与变化具有重要影响(Bott, 1971)。已有研究根据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Granovetter, 1973): 强关系是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 通常发生在群体内部, 信息的重复性很高; 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而来。对农民工而言, 强关系囊括了发生在乡土社会所拥有的亲缘、地缘关系, 往往在婚恋观念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同质性; 而弱关系可以将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联系在一起, 具有借用、摄取社会资源的作用, 关系

越弱,越可能获取好的社会资本(Lin, 1982; 林南, 2003、2005)。弱关系的“信息桥”和“借用、摄取社会资源”的作用,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发展(黄凤, 2002),有利于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最终可能改变其原有的传统婚恋观念。

较大的网络规模和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的存在都为农民工接触各种各样的婚恋观念创造了条件,然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其网络成员的婚恋观念的综合影响。最终通过社会网络,原有的观念可能会在占据优势地位的或强势观念的影响下,在社会学习与社会影响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Carrington, 1988;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Kohler et al., 2001; Montgomery et al., 2001; Ataca and Berry, 2002)。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有以下假设:

H1: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婚恋观念的现代性可以体现为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H1.1: 社会网络中弱关系的存在有利于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的增强,使得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H1.2: 较大的网络规模有利于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的增强,使得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H1.3: 社会网络成员的婚恋观念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趋同于网络成员的态度。

2.1.2 社会融合因素

王春光(2003)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指出,社会融合是指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由于户籍制度及附属于其上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在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和政治参与上长期被隔绝,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而社会网络资源的欠缺会进一步影响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社会融合程度则会影响到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观念和主流文化的接受(王春光, 2001)。因此,流动时间、居住环境、受歧视程度、和方言掌握程度等反映社会融合的变量会对农民工婚恋观念有重要影响。

研究证明,外国移民在接受国的融合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完全同化三个阶段(Sauvy, 1966)。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永久性迁移人口,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是一种暂时性迁移,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只经历了所谓的“定居”和“适应”过程。尽管许多农民工没有最终被“完全同化”,但在城市的经历和见识同样有利于改变他们原有的传统婚恋观念。来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受到城市工业文明价值观念的影响,可能导致其婚恋观念与行为发生转变。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有两种居住方式:聚居(可分为工棚式和村落式聚居)和散居(可分为租房式和进入家庭式散居)。居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和融合程度:从事建筑业和大型加工业的多属于工棚式聚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相对隔绝;个体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多属于村落式聚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也较少接触;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多采取租房式散居,保姆或借住亲戚家的主要采取进入家庭式散居,他们不与老乡发生紧密的协作关系(靳小怡等, 2005; 蔡昉, 2001)。聚居可使农民工较容易地接触到其亲缘和地缘关系,不利于其与主流社会与城市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而散居则恰恰相反,因此,居住方式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通常可以用来衡量外来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刘玲, 2001),可以反映社会融合程度的高低(王春光, 2001),较高的市民化程度和较好的社会融合状态,有利于其传统婚恋观念发生改变,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歧视也可能是农民工婚恋观念改变的影响因素:城市社会和居民对农民工歧视等不友好行为将阻碍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不利于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融合,导致他们对城市工业文明下的观念

和行为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其传统婚恋观念的改变。

根据上述社会融合因素影响的分析,本文有以下假设:

H2: 社会融合程度高的农民工,其婚恋观念更易趋同于城市市民,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H2 1: 流动到城市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更易持较宽容的态度。

H2 2: 散居在城市社区居住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更易持较宽容的态度。

H2 3: 对流入地方言掌握较好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更易持较宽容的态度。

H2 4: 在流入地很少受到歧视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更易持较宽容的态度。

2.1.3 个人因素

教育水平、收入等个人因素也会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产生影响,其中教育水平所起到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行为的自主性。除此之外,本文将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收入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据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民工婚恋观念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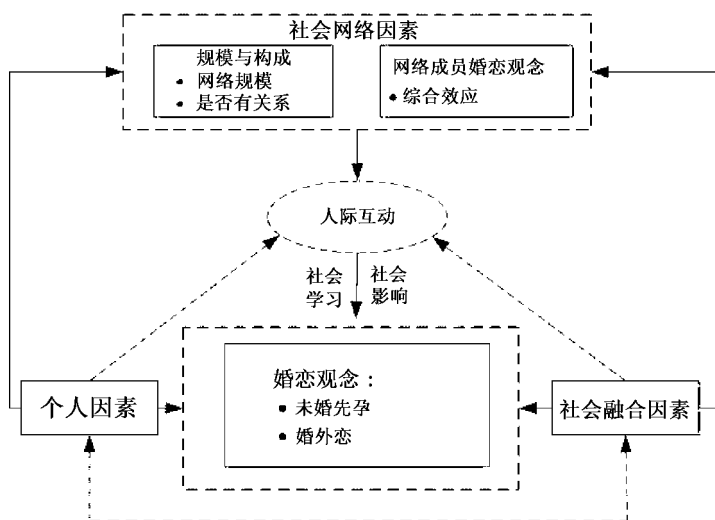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民工婚恋观念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5 年 4 月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此次调查的对象为“年龄在 15 周岁以上,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民工”。

调查对象按居住类型分为两类:聚居类和散居类,聚居类农民工指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工棚或者相对集中的外来人口聚集的村落中的农民工;而散居类农民工指分散居住在市民小区中的农民工。对聚居农民工采用整群抽样,散居农民工则采用等距抽样。

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讨论网络、农民工的求职、婚姻、生育、避孕、养老等方面的观念与行为。

调查在 10 个调查点同时展开,历时 8 天,共获得有效问卷 1739 份。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质量控制,分析表明数据质量可靠,基本上可以真实地反映深圳市外来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和社会网络现状。有关本次调查的目的、内容、执行和数据质量的具体描述请参见调查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

2 3 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本文利用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作为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程度的测量, 进而采用 Ordinal 回归, 分析婚姻讨论网络、社会融合因素和个人因素对上述婚恋观念的影响。

2 3 1 因变量

问卷中通过题项“您对未婚先孕(婚外恋行为) 的态度是怎样的?” 来获取农民工相关的婚恋观念的信息, 备选答案为“非常反对”、“反对”、“无所谓”、“赞成”和“非常赞成”五级度量。在回归中, 均将选项“非常反对”和“反对”合并作为“反对”赋值“1”, “无所谓”保持不变赋值“2”, 将选项“赞成”和“非常赞成”合并作为“赞成”赋值“3”。

2 3 2 自变量

(1) 社会网络因素

社会网络因素包括网络中是否有弱关系、网络规模和未婚先孕(婚外恋) 的网络影响效应。网络中是否有弱关系为虚拟变量, 有弱关系赋值为 1、没有为 0。网络规模是指调查对象的婚姻讨论网络中的成员数目。利用农民工婚姻讨论网络中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婚外恋”) 的态度, 以相应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为权重, 采用式(1) 加权计算网络影响的总效应:

$$\text{网络影响效应} = \sum_i^n I_i \times A_i \tag{1}$$

式(1) 中: I_i 为第 i 个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 分为“十分亲密、比较亲密、一般、不太亲密和很不亲密”五个等级, 并分别赋值 5、4、3、2 和 1; A_i 为第 i 个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的态度, 分为非常反对、反对、无所谓、赞成和非常赞成, 分别赋值 - 2、- 1、0、1 和 2, n 为网络成员数。回归分析中, 将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婚外恋) 态度的总影响效应划分为无效应(总效应值为零)、正效应(总效应值大于零) 和负效应(总效应值小于零) 三类, 以无效应为基准变量。

(2) 社会融合因素

社会融合因素包括流动时间、居住环境、当地方言掌握程度和是否受过歧视。流动时间即从初次打工的时点到调查时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分为三类: 与深圳人居住、相对独立的外来人口聚居地、以及同深圳市民与外地人的混合居住区。方言掌握程度分为“听不懂”、“仅能听懂”和“会说”。是否受过歧视分为“经常发生”、“偶尔”和“从未”。流动时间为连续变量, 直接纳入模型, 居住环境、当地方言掌握程度和是否受过歧视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纳入模型, 参照项分别为“聚居”、“听不懂”和“经常发生”。

(3)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平均月收入。本文将年龄分成三个类别: “24 岁及以下”、“25 岁至 34 岁”和“35 岁及以上”; 受教育水平分为三个类别: “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均用分类变量纳入模型, 参照类分别为“女性”、“24 岁及以下”、“小学及以下”和“未婚”。平均月收入(取对数) 为连续变量, 直接纳入模型。

具体分析中将上述各类变量逐个放入共建立三个回归模型。在模型 1 中考察社会网络的质量特征(有无弱关系)、数量特征(规模) 和网络影响的总效应对因变量的粗影响; 模型 2 中加入流动变量, 考察控制住流动变量后, 社会网络变量对婚恋观念的净影响; 模型 3 是在模型 2 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住个人变量后, 考察网络变量对婚恋观念的净影响。

3 分析结果

3 1 现状分析

3 1 1 农民工流动前后对未婚先孕的态度比较

表 1 给出了农民工流动前后对未婚先孕态度的分布情况。由表 1 可知, 无论流动前还是流动后, 大部分农民工都对与未婚先孕持反对态度。但在流动以后, 他们对未婚先孕的态度较流动前要宽容一些, 持“非常反对”、“反对”态度的比例下降, 持“无所谓”、“赞成”和“非常赞成”态度的比例均有所上升, 经 LR 检验, 这种差别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表 1 农民工流动前后对未婚先孕的态度分布 %

时间	非常反对	反对	无所谓	赞成	非常赞成	LR 检验
流动前(1729)	21. 5	61. 8	14. 8	1. 8	0. 1	***
流动后(1738)	18. 3	53. 1	24. 7	3. 6	0. 3	

数据来源: 根据 2005 年深圳 农民工调查数据整理。

注: 括号内为样本数, 后同; *** $p < 0. 001$ 。

3. 1. 2 农民工流动前后对婚外恋的态度比较

表 2 给出了农民工流动前后对婚外恋态度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 流动前后, 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对婚外恋都持否定态度; 通过与表 1 中农民工对待未婚先孕态度分布的比较, 农民工对婚外恋表现出更加不宽容的态度; 流动后较流动前农民工对婚外恋的态度变得宽容一些, 持“非常反对”、“反对”态度的比例下降, 持“无所谓”、“赞成”和“非常赞成”态度的比例均有所上升, 统计检验显示这种变化是显著的。

表 2 农民工流动前后对婚外恋的态度分布 %

时间	非常反对	反对	无所谓	赞成	非常赞成	LR 检验
流动前(1723)	35. 3	57. 6	5. 7	1. 3	0. 1	***
流动后(1738)	34. 1	54. 1	9. 9	1. 7	0. 2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 $p < 0. 001$ 。

3. 2 影响因素分析

3. 2. 1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3 所示的是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 3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社会网络因素		
未婚先孕的网 络影响效应(零效应)		
负效应	0. 76	0. 43
正效应	0. 02	0. 12
婚外恋的网 络影响效应(零效应)		
负效应	0. 84	0. 36
正效应	0. 01	0. 10
弱关系(无)		
有	0. 14	0. 34
规模	1. 56	1. 06
社会融合因素		
在城市生活时间	5. 67	4. 72
居住类型(聚居)		
混居	0. 43	0. 49
散居	0. 09	0. 29

续表 3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方言掌握程度(听不懂)		
仅能听懂	0.33	0.47
会说	0.25	0.43
是否受过歧视(经常发生)		
偶尔	0.19	0.39
从未	0.79	0.41
个体因素		
性别(男)		
女	0.49	0.50
年龄(0~24)		
25~34	0.40	0.49
35岁及以上	0.33	0.47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738 [*])		
初中	0.58	0.49
高中及以上	0.29	0.46
婚姻状态(未婚)		
曾婚	0.68	0.47
收入(1663 [*])	3.07	0.28
样本数	1739	

数据来源: 同表 1。
* 括号内数字表示某一变量在剔除缺失值后的有效样本数, 没有特别说明的变量的样本量为 1739。

除了网络影响效应应在“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因素分析中不同之外, 其他变量都是相同的。可以发现, 网络影响效应中, 无论是“未婚先孕”的网络影响效应还是“婚外恋”的影响效应, 负效应均占了绝大多数, 正效应分别只有 2% 和 1%。网络成员中包括弱关系的农民工的比例不高, 网络规模不大, 均值仅为 1.56。从社会融合因素可以看出, 农民工平均流动时间不到 6 年, 混居和聚居为主, 1/4 的农工会说方言, 1/3 左右的人可以听懂, 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受到过歧视。

3.2.2 未婚先孕影响因素分析

表 4 是农民工对未婚先孕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由表 4 可知, 社会网络因素是农民工对未婚先孕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农民工社会网络规模越大, 农民工对未婚先孕的态度越宽容。网络成员其未婚先孕态度的综合效应对农民工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 说明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所持的态度对农民工自身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与零效应相比, 正效应导致农民工对未婚先孕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负效应则恰恰相反。

表 4 未婚先孕影响因素的 Ordinal 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网络因素			
弱关系(无)			
有	0.019	-0.090	-0.143
规模	0.215***	0.193***	0.195***
网络影响效应(零效应)			
负效应	-1.063***	-1.025***	-1.011***
正效应	1.259***	1.302***	1.159***
社会融合因素			

续表 4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流动时间		0.008	0.011
居住环境(聚居)			
混居		0.542***	0.491***
与深圳人居住		0.235	0.223
方言掌握程度(听不懂)			
仅能听懂		0.020	0.021
会说		0.232 ⁺	0.222 ⁺
是否受过歧视(经常发生)			
偶尔		0.510	0.647 ⁺
从未		0.320	0.478
个体因素			
性别(男)			
女			-0.313**
年龄(0~24)			
25~34			0.250
35岁及以上			-0.169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43
高中及其以上			-0.082
婚姻状态(未婚)			
曾婚			0.110
收入(log)			0.114
-2LL	216.53***	1711.12***	2115.17***
样本数	1738	1738	1738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1$ 。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将社会融合因素纳入模型。社会网络变量的影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分析结果显示, 居住类型和方言掌握程度对农民工的婚姻态度具有比较显著影响: 与深圳市民和外地人混合居住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的增强, 混居较聚居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的态度更宽容些; 会说深圳本地方言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的态度也表现出宽容的一面。而流动时间和歧视因素则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 3 在模型 2 基础上, 加入个人变量后发现, 原来具有显著影响的社会网络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农民工的婚姻态度的影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同时, “歧视”这一因素开始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 表明偶尔受到歧视的农民工要比经常受到歧视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更宽容些。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和收入等个人因素中, 仅性别变量对农民工的未婚先孕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女性农民工对未婚先孕更容易持反对态度。这可能是因为“未婚先孕”的发生, 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所受到的伤害要远远大于男性。

总之, 通过分析发现: 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未婚先孕态度有显著影响, 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综合效应均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社会融合因素中的居住类型和方言掌握情况也对农民工婚恋观念的重要影响因素; 个人因素中仅有性别变量的影响显著, 女性对未婚先孕表现出更加反对的态度。可以看到, 假设 H1.1 未通过验证, 这可能与有弱关系的被访者比例过低(有弱关系的被访者比例仅占分析样本的 14%) 有关, 从而影响了该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程度。但总体而言假设 H1 基本得到验证, 假

设 H2 也得到了验证。

3 2 3 婚外恋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对婚外恋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5。由表 5 的分析结果发现, 模型 1 中, 与未婚先孕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类似, 社会网络是农民工对婚外恋的态度的重要的影响因素。网络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农民工婚姻讨论网络的规模越大, 农民工对婚外恋的态度越是宽容些。同样地, 网络成员对婚外恋的态度对农民工具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与零效应相比, 网络成员对婚外恋越宽容, 农民工也比较宽容, 网络成员对婚外恋越反对, 农民工也越反对。

表 5 婚外恋影响因素的 Ordinal 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网络因素			
弱关系(无)			
有	- 0 241	- 0 298	- 0 230
规模	0 159*	0 176**	0 182* *
网 络 影 响 效 应(零 效 应)			
负效应	- 1 322***	- 1 375***	- 1 314* **
正效应	0 938**	1 149***	1 043* *
社会融合因素			
流动时间		0 038**	0 041* *
居住环境(聚居)			
混居		0 302+	0 281+
与深圳人居住		0 156	0 327
方言掌握程度(听不懂)			
仅能听懂		- 0 101	0 017
会说		- 0 344+	- 0 182
是否受过歧视(经常发生)			
偶尔		1 228+	1 299+
从未		1 353+	1 482*
个体因素			
性别(男)			
女			- 0 565* **
年龄(0~ 24)			
25~ 34			
35 岁及以上	- 0 200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 0 080
高中及以上			- 0 387
婚姻状态(未婚)			
曾婚			- 0 122
收入(log)			- 0 701*
- 2LL	155 51***	1037 33***	1271 81***
样本数	1737	1737	1737

数据来源: 同表 1。

*** p< 0 001, ** p< 0 01, * p< 0 05, + p< 0 1。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加入了社会融合因素。社会网络因素的影响依然显著, 变化不大。而社会融合因素中的流动时间、居住类型、方言掌握程度和歧视均对农民工所持的婚外恋的态度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流动时间越长,其对婚外恋越容易持宽容态度;混合居住的环境有利于农民工婚恋观念的现代性增强,使其对婚外恋的态度更宽容;偶尔受到歧视、或者从未受到歧视的农民工较经常受到歧视的对婚外恋更加宽容一些。但与对未婚先孕的态度恰恰相反,与根本听不懂方言的农民工相比,会说本地方言的农民工对婚外恋的态度表现得更不宽容,其原因有待继续探讨。

模型3中将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加入到影响因素分析中。可以发现,除了方言掌握程度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以外,社会网络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农民工在婚外恋上的态度的影响并未发生多大改变。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中,仅性别和收入对农民工的婚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同样地,女性在对婚外恋的态度上较男性更加的反对,可能也是因为在婚外恋这样的事件中,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伤害会更严重些;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对婚外恋的态度越反对,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民工这一群体中,收入的多少与工作时间成正比,一些年龄较大,担负着整个家庭重担的农民工会自愿的加班以提高收入,这部分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往往比较传统。

通过模型1~3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网络因素、社会融合因素和个人特征均对农民工的未婚先孕的态度上具有重要影响。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综合效应、流动时间、居住类型、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程度、性别和收入均在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增强的影响因素。综合来看,假设H1.1未通过验证,如前所述,这可能具有弱关系的被访者比例过低有关;但总体而言假设H1基本得到验证,假设H2也得到了验证。

4 讨论与总结

本文利用深圳调查数据,基于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间接反映了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并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Ordinal回归对农民工婚恋观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除了“弱关系”假设未得到验证之外,其他假设基本通过了验证。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流动之后,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发生了显著地改变,现代性有所增强,他们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变得比较宽容;但是对“婚外恋”的反对态度较对“未婚先孕”更强烈一些。

其次,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婚姻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观念的综合效应均是农民工对待“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行为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态度越宽容;网络成员的婚恋观念对农工具有示范效应,与零效应相比,网络成员对婚外恋越宽容,农民工也比较宽容,网络成员对婚外恋越反对,农民工也越反对。这表明网络变量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说明农民工社会网络是其婚恋观念现代性逐渐增强的重要途径。该结论进一步证明,社会网络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其观念和行为的变迁(杨绪松等, 2005; 靳小怡等, 2005;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Eklund, 1999; Kohler et al., 2001)。

再次,在流动过程中,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持较宽容的态度。与城市人群混居,较好地掌握当地方言,都有助于农民工的婚恋观念趋同于城市社会的婚恋观念。而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在阻碍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同时,也成为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增强的一种障碍。

最后,发现性别是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女性更加反对这两种行为的发生,这可能因为在类似事件中,女性往往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要承受较大的压力和伤害。

总之,本文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是农民工观念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新构建的社会网络是增强农民工婚恋观念现代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对农民工婚恋观念具有重要影响,较好的融合程度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文明和观念的认同,有利于农民工群体最终转变传统的乡土观念和行为习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关乎中国社会

经济的和谐发展。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融合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和城市居民观念和行为的互不认同。农民工婚恋观念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一方面促进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融合;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加剧“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现象的发生,不利于城乡社会的婚姻家庭稳定,并且对有效计划生育管理、未婚女性农民工的生殖健康水平、保护未婚的女性农民工及其婚外生育子女的合法权益带来不利影响。上述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旨在提高农民工群体整体福利的相关公共政策、进行有效的政策干预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本文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文仅从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行为的态度来探讨农民工的婚恋观念,还显得不够全面。其次,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本文仅研究了农民工的婚恋观念,无法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行为的现状和成因给出进一步的分析。再次,影响农民工婚恋观念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其它方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蔡昉. 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 曹子玮.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络与网络内资源流向. 社会学研究, 2003; 3
- 3 陈印陶. 打工妹的婚恋观念及其困扰. 人口研究, 1997; 3
- 4 风笑天.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人口研究, 2006; 1
- 5 郭显举. 浅谈我国农村家庭观念的若干变迁. 学术交流, 1995; 3
- 6 靳小怡, 彭希哲, 李树茁, 郭有德, 杨绪松.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 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人口与经济, 2005; 5
- 7 林南.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 2
- 8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9 刘玲. 都市里的村民: 中国大城市的农民工.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0 李树茁, 杨绪松, 悦中山, 靳小怡.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a; 1
- 11 李树茁, 杨绪松, 任义科, 靳小怡.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 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当代经济科学, 2007b; 1
- 12 李银河. 独身现象及其文化含义. 中国社会科学, 1991; 3
- 13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报告. 2005
- 14 谢小亮. 多解的婚姻方程式——当代青年婚姻观调查. 数据, 2005; 11
- 15 杨秀莲. 现代文化冲击下农村婚恋观念的变迁及特征.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5; 3
- 16 杨绪松, 李树茁, 韦艳. 浦东外来农村已婚妇女的避孕行为——基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视角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 17 袁阳. 不变的情结与开放的心灵——关于当代青年婚姻家庭观念现状的报告与阐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1
- 18 郑真真.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2
- 19 黄凤. 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研究. 社会, 2002; 11
- 20 渠敬东. 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 柯兰君, 李汉林.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1 W. J. 古德. 家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 22 王春光.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23 王春光. 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 <http://www.cass.net.cn> 2003
- 24 王毅杰, 童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络探析. 社会学研究, 2004; 2
- 25 李树茁, 伍海霞, 靳小怡, 费尔德曼.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性别偏好. 人口研究, 2006; 6

- 26 王跃生. 社会变革与当代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变动——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4
- 27 Ataca B, Berry, JW. 2002 Psychol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marital adaptation of Turkish immigrant coupl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
- 28 Bongaarts J. & Watkins SC. 1996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
- 29 Bott E. 1971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roles, norms,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in ordinary urban famil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30 Carrington P. 1988 Network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Wellman & Berkowitz (ed.)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New York
- 31 Eklund, L. 1999. Gender roles and female labor migration: A qualitative field study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Report from a Minor Field Study*: May– July
- 32 Friedkin, NE, Johnsen, Eugene C. 1997 Social positions in influence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9: 209– 222
- 33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 34 Kohler, Hans– Peter, J R Behrman, S C Watkins. 2001 The densit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South Nyanza District, Kenya. *Demography* 38 (1)
- 35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Lin Nan. Sage Publications
- 36 Massey D. S. R. 1987 Return to Az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Western Mexic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37 Massey D. S. R., Arango J., Hugo G., et al.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2– 43
- 38 Montgomery MR, Kiros GB, Agyeman, et al. 2001 Social Networks and Contraceptive Dynamics in Southern Ghana. Population Council, New York, *Policy Research Division Working Paper* 153
- 39 Sauvy, A. 1966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Rural Migrant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s Pre-marital and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A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Abstract: Using survey data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in 2005, this paper analyzes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s pre-marital pregnancy and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s is the key approach to change their marriage and sex attitudes, and number and attitudes of network membe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pre-marital pregnancy and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The better the rural migrants integrate to the urban society, the closer their attitudes to those of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Compared with male rural migrants, female rural migrants are less likely to accept pre-marital pregnancy and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Modernization of their marriage and sex attitudes helps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into the urban society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value but might stimulate the occurrence of pre-marital pregnancy and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s

Authors: Jin Xiaoyi is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Ren Feng and Yue Zhongshan are PhD Student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石 玲 收稿时间: 2008– 05)